

·学者对谈·

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主义问题

本—拉斐尔 景天魁

对谈者：本—拉斐尔 (E. Ben-Rafael)，国际社会学机构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ology) 主席
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时间：2002年3月29日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景天魁(以下简称景)：全球化的问题社会学家研究得比较多，也有过许多重要的话题，但是，“9.11”事件以后，社会学家都把恐怖主义的话题纳入到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来思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些新的矛盾和冲突，比如说贫富之间、宗教之间、地区之间的对立，这些矛盾和冲突与现代恐怖主义存在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本—拉斐尔(以下简称本)：恐怖主义是全球化的。因为，现在很难把一个地区与其他地区隔绝开来；而且现在恐怖组织都非常容易得到外界的支持，找到外界的资源。所以，反恐主义的行动也应该是全球性的。因为，如果你在一个地区打击恐怖主义，它总会在一个新的地方找到它的同盟军。

景：恐怖主义的产生是有一个过程的，应该说这些年产生的恐怖主义恰好是全球化过程的一种衍生现象。全球化过程中资源流向和利益格局改变的结果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如贫困问题严重化等。这些问题的产生会引发人们的愤怒、怨气，这是形成恐怖主义的一个直接背景。

本：从客观上来说，全球各地人们的物质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人们的生活比以前要好得多。可是，由于现在的社会是绵延、连续的，人们不是纵向地看，感到自己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而是与其他地方人们的生活进行比较，这样就会有很多的不满，就会有挫折感，就会愤怒，就会倾向于采取极端的措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现在的科学技术为恐怖主义的蔓延提供了可能性。现在，交通运输非常发达，使跨越巨大空间的行动成为可能，恐怖分子可以上午在这里作案，下午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甚至到了地球的另一端，也可以在某国策划一个恐怖主义计划，而在别国实施。此外，全球通讯网络、互联网把所有的人都联结起来，给恐怖分子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还有一种现象，我称之为“CNN 症候群”——因为媒体的全球化，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发生了一点事情，马上就有记者扛着摄像机去报道，立刻，全世界就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全世界的人都来关注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件小事情，于是，采取这个行动的人就变成了世界级的知名人士，变成了世界级的明星，这也是这些人采取这一行动的动机之一。要制造世界舆论的动机刺激这些人采取这样的行动。媒体的全球化也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它给了这些人一个机会，让他们采取一些行动，在这个世界剧场里成为世界闻名的演员，世界闻名的明星。所以，全球化不仅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同时也促使恐怖主义分子产生在全球剧场里表演的动机。

景: 刚才您谈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恐怖主义产生的客观原因, 另一个是技术条件的问题。我觉得技术条件问题, 像传播手段、运输手段都是中性的, 可以成为恐怖主义的手段, 也可以成为反恐恐怖主义的手段。恐怖主义者可以使用它到处活动, 反恐组织也可以利用这些手段打击、监控恐怖主义。

本: 在现在的世界里新闻媒体已经发展了, 他们总是在不停地寻找新闻。如果一个人依法纳税、奉公守法, 按照社会的规则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就根本没有人给他拍照, 也根本不成其为新闻。现在的媒体在找那些让人震惊的、让人难以预料的事情, 恐怖活动正是恐怖分子对媒体这种状况的反应, 比如制造爆炸事件, 媒体就认为这是重要的新闻, 大肆报道。

景: 媒体的扩散之所以与恐怖主义的产生有关, 不在于它有扩散作用, 而在于它在扩散什么? 如果扩散的这些内容足以激发人们的仇恨, 那它可能与恐怖主义有关; 如果扩散的这些内容不是要激发人们的仇恨, 而是扩散一种有意义的知识, 那就与恐怖主义无关。媒体这种手段, 可以让最贫穷国家的人们看到美国人怎样生活。过去, 在没有电视等传媒的时候, 世界是相对封闭的, 没有这种比较,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恐怖主义可能与媒体有关系。问题在于媒体炒作的内容是哪来的? 要搞清楚这一点, 我们有必要搞清楚我们现在所说的恐怖主义与 20 世纪的冲突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们可以把现在的恐怖活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一个比较。两次世界大战的产生可以说是 20 世纪解决那个时代世界范围内矛盾的一种办法。当然, 这种办法是我们都不愿看到、不欢迎的。当时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积累到了一定程度, 就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挑起世界大战显然是为了争夺资源——强国之间在争夺资源。可见, 20 世纪前期或者中期, 世界范围内矛盾的解决往往是运用战争手段, 它的特点是发生在国家之间的, 是为争夺资源的; 而且一般情况下是发生在强国和强国之间, 其他国家是被迫卷入的。那么, 现代恐怖主义有什么特点呢? 它采取极端的手段, 有时不惜针对普通民众, 制造社会恐怖。但如果从它的产生原因上看, 很显然, 恐怖主义的首要目标是美国, 为什么 9. 11 这样的事件发生在美国? 因为它是世界上占有和利用资源最多、最富有的国家。世界范围内富有和贫穷之间的反差极大, 使贫困国家和富有国家之间, 弱势的、边缘的民族和国家与强势的、主流的民族和国家之间形成一种矛盾, 产生一些怨恨。我这样说绝无为恐怖主义的产生作辩护的意思, 但我们应该客观地分析这种冲突是怎么来的。从这样一个视角, 我们看到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的根源及其表现形式。

本: 您一直在强调不平等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我觉得不平等是很多冲突的背景, 不平等也是大量存在的, 像阶级之间、宗教之间有很多冲突, 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我感到, 今天的技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恐怖主义的行为成为可能, 为恐怖主义提供了许多方便之处。我觉得, 恐怖主义在这个世纪的蔓延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因为, 文化方面, 如价值观, 不像经济全球化那样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价值观的蔓延、扩散并不是那么容易被人们、被所有社会都接受的。对有些社会、有些群体来说, 新的价值观, 现代化的、普遍主义的价值观, 对他们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以 20 世纪的纳粹为例, 德国当时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它的人民受到非常好的教育, 它的科学、文学、商业文明都处于欧洲的中心, 处于当时的巅峰状态, 但是它在几年之内就变成了野蛮的、惨无人道的民族, 我觉得不平等并不是其中主要的原因。德国这样一种文化影响到了德国社会民族的灵魂, 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独特的文化, 意识到自己的卓越, 在一定的危机情况下就产生了纳粹主义这样一个怪物。我觉得现在有些伊斯兰社会里, 一些教派对伊斯兰教的某种解释, 不一定是其真正的教义, 以这样的解释为信条就难以适应现代性的普遍的

新的价值观。他们感到难以接受这样的价值观，于是这种冲突就用新的形式来表现。再比如现在的欧盟，欧盟现在存在一种新的身份认同问题。原来是英国人身份的认同、法国人身份的认同，或者西班牙人身份的认同，现在这些好像就不是那么重要。而在他们的内部有很多冲突，像爱尔兰、法国的科西嘉，在这些国家加入欧盟之后，内部的这些冲突就用新的形式来表达，有了新的特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仅有信息的流动、人口的流动、技术的流动，而且还有价值观的散布。比如说，由于平等价值观的全球化的散布，大家都认为平等是很重要的，大家都反感不平等。恐怖主义者就经常出来说，我们战斗是因为我们要追求自由，追求平等，于是大家就给他们鼓掌。由于全球化的媒介的扩散，恐怖主义者就有可能去操纵媒体，给他们自己的行动找一些合法性。

景：恐怖主义与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恐怕不是很容易说清楚的。一般地说，恐怖主义与文化有一定的关系。这里面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文化上的普遍主义，一种是文化上的特殊主义。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人与人的交往范围扩大，交往手段的进化，直接面对着价值观越来越普遍化的问题。我们中国最近加入WTO以后就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在迈向世界的时候碰到了一些普遍的价值、普遍的规则。但是，这些普遍的价值和规则是哪里来的呢？不是你这个国家、人群、社会自生的，但你又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接受，这就有一个所谓本土化、地区化和全球化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目前世界范围内人们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在何种处理下文化才可能变成恐怖主义的温床？我不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这一问题都能够和恐怖主义挂上钩。刚才讲欧洲人，欧洲人上个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在忙着打仗，在21世纪忙着干什么呢？在忙着统一，在建立和加强欧共体。他们现在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用找共同性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这个方式比上个世纪的方式聪明多了。是不是欧洲国家之间现在没有矛盾了呢？不是。但是处理的方式和过去不同，这一点可能与文化有关。比如刚才您讲到的，欧洲人的认同比较容易，法国人也好，德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西班牙人也好，价值观比较接近，有这个前提比较容易认同。尽管在欧洲范围内有爱尔兰问题，也有别的什么问题，但基本上不是文化的问题。亚洲有比欧洲更复杂的文化背景，起码亚洲不仅仅是一种文明。中国的文化，日本的文化，印度的文化，东南亚的文化，其复杂性要比欧洲大得多。亚洲人尽管并没有忙着搞统一、一体化，但从我们比较熟悉的东亚地区的情况看好像也不倾向于用恐怖主义的方式来解决本身的问题。原因何在？与文化的特点有关。亚洲文化内部似乎也是愿意找一些共同性，不管共同性大一些也好，小一些也好，不是统一什么，而是找共同性。现在中国和日本有一些矛盾，但也有一些文化上的共同性，中国和东南亚也找一些文化上的共同性，现在中国还要和东南亚建立自由贸易区。总而言之，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并没有导致他们在相互之间选择恐怖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矛盾。那么，什么人要选择用恐怖主义的方式来解决价值观问题、文化的问题、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问题呢？您刚才提到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问题。在伊斯兰内部有教派，有相互之间冲突的问题，这是不是与恐怖主义有直接的关系，要看具体情况。如果说美国的文化和中东的文化不发生碰撞，没有一个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区别，没有对弱势文化的压抑、鄙视、排斥甚至促其走向灭绝，而是都把它当作可以认同的东西，能产生恐怖主义吗？恐怖主义的产生不是因为存在着文化的差别，而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不能共存性。如果大家觉得有矛盾、有差别，但是还可以呆在一起，那也不用诉诸这套恐怖主义的方式。所以我想，文化的问题本身有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问题。但是真正构成恐怖主义的文化基础是一种极端的普遍主义和极端的特殊主义的不能共存、不能相容性。

你非得认为我们的就是普遍的,凡与我们普遍的东西不同的就都是劣等的,是不允许存在的,那你就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的目标。我们谈文化的时候,就会涉及绝对的普遍主义、绝对的特殊主义,要从这里去具体探讨恐怖主义的文化成因。

本:有两种不同形式的革命,一种是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是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上不平等的人、被压迫的人应该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作为一个阶级来革命。但无政府主义却采取这里扔一个炸弹,那里扔一个炸弹,实际上他们不是代表大多数被压迫的穷人的利益,代表的是很小的群体,很少的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他们的战略就不同,他们采取恐怖主义的做法。如果你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你可以谈判,通过谈判达成妥协,你给我这个,我给你那个,你放弃这个,我放弃那个,最后能够达到妥协,让更多人得到利益。现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小群体是不可能达到妥协的。他们不愿意妥协。用正当的方式不能满足他们小群体的最大利益。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9.11炸美国的世贸大楼?谈判的双方到底是谁?他们站在哪一边?他们有什么条件?实际上根本就什么都没有,他们根本就没有谈判达到妥协的过程。我非常同意您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想在这个世界上很有尊严地生活下去就需要妥协,双方都要妥协。比如说,我是赞成普遍主义的,但我也能容忍特殊主义;特殊主义者呢?我自己是特殊主义的,但同时我也能够尊重、理解普遍主义。双方都有一定的妥协,才能在这个地球上,在这种全球化的条件下有尊严地生活。要尊重对方的各方面的特征。比如说,你是中国人,他是以色列人,他是美国人,他是法国人,大家都能够互相尊重。但是恐怖主义就不会这样。我认为恐怖主义的核心不是代表穷人,也不是代表被压迫阶级。他们只代表很小的一群人,这一小群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希望得到很多东西,就采取了恐怖主义。克劳塞维兹说过战争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政治。对恐怖主义来说,和平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战争。

景:我们从经济讨论到文化,又从文化讨论到政治。从经济上讨论,是一个利益问题,这个比较容易谈;文化上的问题是一个价值的问题,不太容易谈,也可以谈;政治上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目前这个世界还缺乏公正的、合理的、讨论国际政治的条件。如果一个国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打谁就打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还有什么讨论的余地,有什么公正可说?至于说到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我看到底谁是多数,谁是少数,怎么界定多数和少数,还很难说。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合理的国际秩序,就会导致一些人不得不用极其特殊的“形体语言”来说话。毫无疑问,恐怖主义针对平民百姓的暴力行为,是不人道的,应该予以严厉的谴责和坚决的制止。但是,我觉得要想从政治上讨论恐怖主义的问题,就应该确立一种基本的前提,就要有对话的机制,要有一种比较公正合理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不采取特殊的、极端的手段,而是摆在桌面上来讨论,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如果从政治上来看恐怖主义,那就是因为没有有一个办法将这些人要说的话、他们的利益要求,通过正常的、合法的、公开的渠道表达出来,他们就采取一种非正常的、极端的、特殊的办法来发言。我们在谴责和制止恐怖主义的同时,也要深入思考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的条件。

本:我不认为所有的冲突都不能解决。一些小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是可以谈判的。有的冲突比较容易解决,比如您刚才说的,经济上的比较好解决;文化上的比较难,但也可以解决;政治上的比较难解决。我希望跟您也达成一定的协议。我首先同意您一个观点,也希望您同意我一个观点。我接受您的观点:多数人应该足够聪明,应该知道给少数人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希望您也能接受:恐怖主义并不完全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恐怖主义代表的是完全没有妥协余地和空间的一群人,他们要进行的是全面的战争,没有任何妥协的迹象。所以,我的结论是:

解决少数人的问题时就假设他们不是恐怖主义,与恐怖主义作斗争时要假设他们不属于少数人。

景:关于恐怖主义的讨论我们已经涉及了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方面。本·拉斐尔教授是 IIS(国际社会学机构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ology)的主席,我想请您简单讲讲我们作为社会学家,对于恐怖主义的问题,从社会学学科研究的角度来说应该怎么研究,或者说恐怖主义给我们社会学提出哪些具体的课题或挑战?

本: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因为社会学家研究与社会有关的方方面面,而恐怖主义又是社会的一个问题,所以社会学家也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本来以为,新的世纪来到了,大家可以喘口气了,可以轻松一下了,可是没有想到没有玫瑰花园在等着我们。9.11 事件好像意味着一个新世纪的开始。新的时代是一个冲突的时代,也是一个责任的时代。作为社会学家,不仅仅要去分析问题、定义问题、发现问题,不能纯粹地用纯科学的眼光观察世界,而且要有道义感,要有道德的责任。恐怖主义的出现对社会学家是一个新的挑战。我不准备引用太多的观点,我只想引用一位您熟悉、学习过,我也学习过的卡尔·马克思的话:哲学的目的不仅仅要解释世界还要改造世界。

景:我们明年将要承办 IIS 社会学大会。从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来说,现在我们面临的世界的特征,它的发展趋势,它的矛盾冲突的特点和解决方式,与经典社会学家面对的那个世界已经大不一样了。在 19 世纪的那个时代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学的一些理论视角及其方法,就有可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受到新的挑战,需要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为社会学在新时代的发展,奉献我们的思想和智慧。

录音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研究生王俊秀
责任编辑:张宛丽

“华人社会社会排斥与边缘性问题”研讨会在香港召开

2001 年 11 月 16—18 日,由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华人社会社会排斥与边缘性问题”研讨会在香港召开。本次会议主题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领域中最热烈的讨论问题——社会排斥与边缘化的概念和理论。在这个主题下,大会又设立政治与管治、工作与就业、性别与性、移民与族群、边缘青少年、健康与社会照顾、非政府组织 7 个分题,与会者主要就华人社会中社会排斥与边缘性的成因、性质、类型、形式、内容、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等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美国、日本、马来西亚、台湾和中国大陆专家学者、社会工作者和政府机构决策者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刘继同)